

奥什事件:吉尔吉斯-乌兹别克族际冲突探析

侯艾君

内容提要 发生在1990年和2010年的两次奥什事件——吉尔吉斯族和乌兹别克族的两次严重的族际冲突是当代中亚族际冲突的典型案列。事件导致了严重后果,在很长时期里都会消极影响相关中亚国家内部的族群关系和国家间关系。本文试图从历史-文化差异、现代化进程乃至民族-主权进程的角度考察吉尔吉斯斯坦南部的吉尔吉斯族和乌兹别克族两大族群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分化的后果,探讨两大族群之间的矛盾生成机制和族际冲突的根源,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一些规律性认识。

关键词 族际冲突 政治暴力 现代化 非对称平衡

族际冲突是多发于多民族国家的新型政治暴力,也是国际政治中的常见现象,既表明族群政治形势恶化,也往往是民族-地区政策失误的结果。1990年夏,在苏联吉尔吉斯共和国南部奥什市爆发吉尔吉斯-乌兹别克两族的血腥冲突,造成严重伤亡。这是苏联末期爆发的多起民族冲突之一,也是当代中亚地区族际冲突的典型案列。至今为止,俄罗斯、中亚学界出版了一些文献集、论文以及大量政论,苏联前总理雷日科夫、吉尔吉斯前总统阿卡耶夫等人都曾谈及奥什事件。对1990年奥什事件的根源有多种观点:吉-乌两族文化差异;社会经济矛盾;政府举措失当“克格勃阴谋”说——如“吉尔吉斯民主运动”(ДДК)领导人吉帕尔·杰克舍耶夫持这种观点,因为当年苏联多地都爆发了类似的族际冲突,而苏联中央的政治家希望利用这种局势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观点遭到反驳,著名作家钦吉兹·艾特玛托夫表示这并非中央的过错,而是“我们自身的过错”;^①而乌兹别克族人则认为,奥什州党委第一书记乌森·希迪科夫鼓动、挑唆了族际冲突;^②还有人强调吉尔吉斯民族主义组织(或乌兹别克民族主义组织)在其中发挥的消极作用,等等。

就在整整20年后的2010年6月,在独立的吉尔吉斯再次上演吉-乌族际冲突,脚本、进程及其后果都与第一次极为相似,吉-乌矛盾似乎已成死结。两次奥什事件都有非常复杂深刻的历史和现实根源。对该事件的深入探究,有助于了解当代中亚族群问题的历史和现状、族际冲突对中亚国家发展进程的影响,认识族际冲突的生成机制,对防范族群冲突有所裨益。本文首先尝试从现代化进程和民族-主权进程的维度考察中亚族群冲突,为探索吉-乌族际冲突的根源提供新视角,并对奥什事件与苏联末期的政治进程和多起民族冲突事件进行综合分析。

一、吉-乌冲突:历史-文化根源与现代化进程

首先,吉-乌族际冲突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根源。研究者一般会强调吉-乌二族之间的文化差异,

^① Ошская резня 1990 года. Хронология трагедии <http://www.fergananews.com/article.php?id=6601>

^② Санобар Сеноматова, Аскар Акаев: события июня 1990-го и июня 2010-го имеют одну и ту же причину, <http://www.fergananews.com/article.php?id=6633>

但是作为邻族,吉尔吉斯族和乌兹别克族的民族差异是历史形成的,中亚所有族群之间都有紧密的历史、宗教、文化等方面的联系。吉尔吉斯族和乌兹别克族都经历了漫长的民族形成过程,有一定的亲缘性:同属突厥语族;族源都与突厥人、蒙古人入侵中亚相关;均信仰伊斯兰逊尼派;曾在数百年时间里聚居共处;等等。但两族在生产和生活方式、民族心理、文化传统等方面仍存在很大差异,因争取民族发展空间而相互竞争。19世纪末,俄罗斯帝国征服中亚时,在今日吉尔吉斯斯坦南部,比邻而居的吉尔吉斯族和乌兹别克族都认为自己是本地人,而将对方视为外来人。吉尔吉斯族需要牧场,而乌兹别克族需要耕地。乌兹别克族的祖先曾经游牧,但很早就已改为农耕,而吉尔吉斯族直到苏联时期仍有不少人在天山游牧、或亦农亦牧。就伊斯兰信仰来说,人们通常认为游牧的吉尔吉斯族不像农耕定居的乌兹别克族那样虔诚、严守戒律。此外,乌兹别克族的经商才干较为突出,在当地的经济生活中很活跃,控制甚或垄断了主要商业网络,生活水平往往高于他族(也高于相邻的乌兹别克斯坦)。乌兹别克族聚族而居,凝聚力强,而传统、淳朴的吉尔吉斯社会往往鄙视经商者和贪财好利的行为。在大众心理层面,吉尔吉斯和乌兹别克两族存在互不信任、互相敌视的情形。当然,这在多数情况下只是一种感性色彩强烈的偏见——实际上,中亚所有族群彼此间往往都有各种成见和消极看法,当经济恶化、社会心理失衡时,经济上较成功的乌兹别克族就会受到其他族群的嫉恨。文化差异绝不是族际冲突的直接和充分根源,而只是一个形式上的前提,这种差异的政治学意义很难量化,但在族群关系紧张时期其作用却会凸显,也往往被人为夸大。实际上,经过长期混居,吉尔吉斯共和国南部的吉、乌两族在生活习俗、民族心理等方面互相趋近,而南北部吉尔吉斯族则发生了社会-文化分化。在苏联早期,吉尔吉斯共和国南部的吉尔吉斯族与北部的吉尔吉斯族差别很大,互生隔阂。^①

其次,现代化进程以及伴随的民族自决乃是现代民族形成的前提和路径,随之,族群政治成为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而这也是现当代族际冲突的前提,尤其是大规模族际冲突几乎都与现代化进程相关。因此,当代政治生活中的族群冲突本身就是现代性现象,堪称是现代化进程的消极伴生物。现代化进程令中亚各族发生社会分化,打破族际政治平衡,成为族际冲突的社会-经济、社会-政治根源。

中亚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始于俄罗斯帝国时期,而到苏维埃时期迅速加快。帝俄开发和建设中亚主要将其作为资源产地和商品倾销地,同时也出于战略和国防考虑——从经济上征服刚刚被军事征服了的中亚地区。现代化进程具体包括工业化进程、城市化进程、人口进程(对人口的现代化改造、移民活动等等)。民族本身既是一个历史现象,又是一个现代性现象。在前现代,中亚居民并无族群意识,或族群意识很不发达。在19世纪,当中亚居民被问及“你是谁”这样的问题时,通常回答我是穆斯林,更多的时候则是自称布哈拉人、撒马尔罕人等等。也就是说,在中亚居民的多重认同中,首要认同是宗教认同——穆斯林,其次才是部族、地区(乡土)等方面的认同。中亚各族演进为现代民族既是自然进程,更是人为推动和灌输的结果。苏联时期的现代化进程令中亚各族快速演进,初步具备现代民族的轮廓和特征。在1924—1936年间,苏联政府根据人口规模和历史、文化特点,对中亚各族进行民族识别,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每个加盟共和国都是多族混居,且几乎每个加盟共和国中都有一些地方是某一非主体民族(或称“冠名民族”)占多数。这种做法通常被认为是沿袭俄帝国的“分而治之”的策略,有助于各族互相牵制,保持族际政治平衡。在实践中,这一政策使各族群的政治组织程度加强,民族意识强化,族群成为一个自我意识明确的政治-经济单位。奥什地区原本不是吉尔吉斯族的传统聚居区,但苏联政府划给了吉尔吉斯共和国。在统一的苏联国家,这些举措有益于各族、各地加强联系,保持族群平衡;而到1991年苏联解体前后,就

^① Мелис Мырзакматов, В поисках истины. Ошская трагедия: документы, факты, интервью, обращения и заявления, Бишкек, Турар 2011г. С. 238.

成为苏联遗留的消极遗产,成为纷争和不睦的根源。

现代化进程摧毁了各族的传统生活方式,中亚的人口进程也加快了。这种人口进程有其特殊性:既源自对现代生活的向往,是自然进程;同时也存在人为性,如斯大林时期的强行集体化进程,以及1954年后对中亚和西伯利亚的大规模垦殖运动,大量人口涌入中亚,等等。从表1—3中的数据可知,吉尔吉斯共和国南部在很长时期里都是乌兹别克族占人口优势,这也成为当地乌兹别克族渲染历史悲情的依据。经过当地政府努力,吉尔吉斯族人口比例上升很快,但主要集中在农村,城市里的吉尔吉斯族经济地位低于乌兹别克族,类似寄居的外来人口。

表1. 1926年奥什和乌兹根各族人口分布^①

奥什和乌兹根市各族分布情况	奥什	乌兹根
吉尔吉斯族	1%	2.2%
乌兹别克族	90.1%	93.2%
俄罗斯族	5.6%	0.8%
其他民族	3.3%	3.8%

表2. 历次全苏人口统计时奥什州城市人口中的民族构成^②

民族/年份/占比	1959年	1970年	1979年	1989年
城市总人口	278726	381282	464652	570334
吉尔吉斯人	34963(12.5%)	68848(18.1%)	120252(25.8%)	183496(32.2%)
乌兹别克族	71542(25.6%)	106984(28.0%)	136824(29.4%)	185824(32.6%)
俄罗斯族	95436(34.2%)	123456(32.3%)	123867(26.6%)	113326(19.9%)
其他民族	76785(27.7%)	81994(21.6%)	83708(18.2%)	87688(15.3%)

表3. 历次全苏人口统计时奥什州农村人口中民族构成^③

民族/年份/占比	1959年	1970年	1979年	1989年
农村总人口	590682人	851599人	1080827人	1426490人
吉尔吉斯族	375784(63.6%)	573009(67.3%)	746836(69.1%)	1008637(70.1%)
乌兹别克族	132837(22.5%)	205710(24.2%)	264085(24.2%)	334702(23.5%)
俄罗斯族	24629(4.1%)	21337(2.5%)	15804(1.5%)	12783(0.9%)
其他民族	57432(9.8%)	51543(6.0%)	54102(5.0%)	70368(4.9%)

苏联的意识形态宣传称,游牧是落后的生活方式,在现代化语境下,这自有其依据,从游牧转向定居后的另一重要意义在于,定居人口比游牧人口易于管理,更易于组织动员,方便进行苏维埃化改造。赫鲁晓夫推行的“本地化”政策,乃至1954年开始的中亚垦荒运动,以及对被流放民族的平反举措令吉尔吉斯共和国的人口格局发生变化。许多游牧人口改变生活方式,开始定居,从事农业生产,或亦耕亦牧。城市化进程导致人口涌入城市,从牧业人口变成农业人口,农业人口再变成工业人口。大量定居人口开始接受现代教育、培训,为工业化进程提供人力资源,以族群为单位发生了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分化,直到1991年,中亚现代化进程也并未最终完成,各国并未能成为工业国家。

人口进程导致各族群交流、交往频繁,易于爆发族际冲突。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中亚地区爆发多起族群冲突。对于冲突各方来说,暴力成为族群政治的重要经验。一般来说,极强大族群

①②③ Ольга Брусина, «Аграрное перенаселение как одна из причин Ошск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 1990г//Профи, 1999г, №11, с. 20-23.

和极弱小族群之间不会爆发大规模冲突,冲突往往爆发在两个旗鼓相当、或具有不对称平衡特征的族群之间。相对弱势一方(或在前次冲突中受害更重的一方)往往更寄希望于政府保护,对抗强势一方的压力;而强势一方则倾向于倚恃族群优势,避开政府,擅自解决。族际冲突之后,双方都对下次冲突有预期:受害一方伺机复仇,而占上风的一方会竭力继续压制另一方,防止其上升、或翻盘;因族际冲突而被削弱的一方暂时无力与强势一方对抗,需要时间积聚能量。随着现代化进程,吉尔吉斯共和国的吉、乌两族之间的不对称平衡的状况一直延续、甚至强化。

现代化进程放缓或停滞,又在另一重意义上影响族际关系。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中亚经历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现代化进程。而到戈尔巴乔夫执政前后,吉尔吉斯等加盟共和国的农村和牧区陷入凋敝,城乡差别明显。共和国领导人仍旧习惯于坐等中央指令,而不是着力提高本地居民的生活水平。从1985年到1988年,吉尔吉斯经济快速增长。但是到1989年,苏联预算缺口达到9200万卢布,工业生产迅速下滑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水平。到80年代末,吉尔吉斯共和国乃至整个中亚地区都陷入经济危机:消费市场严重失衡,食品、鞋袜、五金日杂等严重匮乏。

工业化进程滞后导致就业困难,城市化进程放慢;大量农村人口短期内涌入城市,而城市住房的建设速度缓慢,住房供需矛盾突出。20世纪80年代中期,农村青年进城是当时中亚的普遍问题。当时乌兹别克共和国曾拨出地块,用于建房。^①到1991年前后,中亚“人口爆炸”的后果显现,许多工厂因亏损而停工、关闭,开始了某种“非工业化”进程,大量年轻人口无法安置,成为潜在的隐患。在吉尔吉斯共和国,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奥什和伏龙芝,但是苏联法律明确禁止在加盟共和国首都拨地供私人建房。1989年,伏龙芝郊区爆发了“自行占地”运动(самозахват),吉尔吉斯共和国领导人用一年时间处理,而奥什地区也爆发了类似事件,当局却未能及时回应。到1991年之前,吉尔吉斯共和国全境共计45500人从农村迁往城市或镇里,迁往伏龙芝市的就有17000人。这种急剧的人口进程发展为一个具有威胁性的社会-政治问题。与乌兹别克族不同,吉尔吉斯族不善农耕,因而许多农村青年涌入城市(尤其是比什凯克和奥什两城市),造成城市住房紧张。这些涌入的人口同时也是活跃的政治力量。吉尔吉斯共和国没有优先考虑满足本国公民的需求,尤其是无力解决青年人的住房问题。1989年,许多吉尔吉斯族青年在伏龙芝(后来更名为比什凯克)郊区自行占地建造房屋。政府无力压制类似行为。在整个1989年,吉尔吉斯政府一直着力解决伏龙芝的“自发占地”问题,未考虑应全面解决共和国全境的类似问题:奥什地区的住房问题同样尖锐,很快也发生了类似事件。

其三,在共和国南部地区,吉、乌两族之间形成非对称平衡,成为族际冲突的必要前提。共和国南北方在族群、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差异巨大,政治-文化分裂鲜明。以伏龙芝市为中心的北方地区现代化(“俄罗斯化”)程度最高,俄罗斯族和其他俄语人口占多数;纳伦省、楚河等省的吉尔吉斯族都保持游牧生活方式;而南方则主要从事农业(种植棉花、瓜果),家族势力很大。从1950年到1990年,尽管吉尔吉斯的政治中心在伏龙芝,但南部势力在政治生活中却极为活跃,南北方代表在共和国轮流主政。在奥什和贾拉拉巴德等省的某些地区,乌兹别克族占据人口优势,他们在毗邻的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纳曼干等省都有大量亲族,具有人口、经济乃至心理方面的优势,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乌兹别克族作为农耕民族,始终重视土地,子女很少读书上学,也不喜欢进入政府和公检法机关,而更喜欢从商。另一方面,由于缺乏乌语学校,共和国南部的乌族少年很难接受高等教育,在就业方面也处于劣势。吉尔吉斯族往往生活在山区、农村,多数人在受教育后愿意去政府部门或司法、警察等机关任职。这样,吉、乌二族就在经济、政治方面发生分化:乌兹别克族因经商而多生活在城市,且有良

^① В. Воропаева, Д. Джунушалиев, В. Плоских,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а. Краткий курс лекций по истории Кыргызстана, Бишкек, Илим, 2002г. с. 153.

好的社会经济基础;吉尔吉斯族在各级政府部门占绝对优势,有较高的社会政治地位,但收入较低;而乌兹别克族因经商而生活富足,控制、甚至垄断了商业领域。两族之间生活水平差异大,经济和政治地位并不匹配,积怨加深,成为两个互相对立的群体。乌兹别克族对吉尔吉斯族占据绝大多数政府和公检法机关职位而不满,而吉尔吉斯族则对自己的经济状况不满,不能容忍与乌兹别克族的巨大落差。俄国学者的研究中曾提到:1990年的奥什族际暴行中,乌兹别克族聚居在奥什市和地级城市乌兹根,吉尔吉斯族施暴的典型特点是骑马搜捕乌兹别克族“我的印象是,袭击被看作外族据点的城镇,是对城里人的惩罚;那场冲突具有强烈的城乡对立因素”。^①

由于乌兹别克族的经济和人口优势,到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乌兹别克族在政治方面提出要求:要求将奥什划定为乌兹别克族自治区;重新划定奥什地区的边界;等等。乌兹别克族此前已经收回一座清真寺,引起吉尔吉斯族的不满,^②吉尔吉斯族在“奥什地区”组织的主导下,提出针锋相对的要求。这样,诸如解决住房用地这样的问题就可能上升为政治问题,而两族之间日常的龃龉、不睦就被政治化。考虑到此前后的中亚民族-主权进程,在一个日益主权化的加盟共和国里,经济实力雄厚而政治地位低下的乌兹别克族面临潜在危险。

吉尔吉斯和乌兹别克族在居住地域、社会-经济、政治积极性等方面发生明晰的分化,这种结构性差异是当代吉尔吉斯共和国族群政治生态的重要因素。在吉尔吉斯加盟共和国(及独立的吉尔吉斯国家)非主体族群乌兹别克族与主体族群吉尔吉斯族的非对称平衡成为诱发冲突的危险模式。

二、民族-主权化进程与族际冲突

民族-主权化进程乃是族群冲突的另一条重要线索。从中亚归并帝俄到1991年的100多年间,是中亚各族发展为现代民族、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进程。1924年布尔什维克政权对中亚进行民族识别和民族-领土划界后,中亚民族进程加快,具备准国家特征和轮廓,加盟共和国时期甚至使中亚各族获得了独立建国的经验。戈尔巴乔夫时期是中亚民族走向主权化的关键时期,甚至具有决定性意义。从1985年后的激进改革到1991年苏联解体,中亚各族被动员起来,迅速走向独立——该进程一直持续至今。在此过程中,民族主义作为意识形态日益强化,成为族际冲突的重要背景。

首先,1950年代以后,苏联的民族地区就已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地方主义意识。赫鲁晓夫时期对民族地区推行“本地化”政策,强化了民族地区的自主意识,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各民族地区都以尽可能多地争取苏联中央的财政倾斜、分得更大蛋糕为能事;为本地区争取更大的自主权,尽量减少、摆脱中央的干预;对俄语和俄语族群进行某种限制甚至排挤,在某些领域和某些地区,实际上形成了对俄罗斯族的“逆向歧视”;等等。勃列日涅夫时期对干部群体的政策异常宽松,使得各个民族地区的利益群体日益固化。许多干部都与勃列日涅夫同始终、共进退,形成个人势力。

其次,戈尔巴乔夫改革导致原来政治结构被破坏,族群政治活跃,各民族都已实施了政治动员。几乎所有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都开启争取主权的运动,也在许多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都爆发了族际冲突。“公民社会”在苏联的活跃,本身是中央政府软弱、失控、甚至放任的后果,同时又进一步消解了苏联的政权体系。政府对一些紧迫、棘手的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问题不能及时回应和解决,为民族精英的上升提供了契机。一些政治团体和运动实际上代替了政府的功能,试图以民族主义为号召,实现政治、经济利益的排他性分配。按照苏联总检察长苏哈列夫的判断,奥什事

^① (俄)瓦列里·季什科夫著,姜德顺译《苏联及其解体后的族性、民族主义及冲突——炽热的头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64页。

^② М. Жирахов. Семена распада: войны и конфликты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бывшего СССР.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БХВ-Петербург. С. 170.

件的直接导火索就源自苏联中央,源自戈尔巴乔夫改革。^①

苏联各地(尤其以中亚和高加索等地为甚)爆发多起严重族际冲突,“重建”进程使得吉尔吉斯共和国原有的家族政治结构在新形势下改头换面发挥作用。无论在北高加索、还是中亚,许多民族冲突实际上与苏联中央领导人和加盟共和国精英之间的政治博弈密切相关,民族冲突成为政治斗争的手段。例如,车臣危机被认为是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恶斗的结果:叶利钦抵制戈尔巴乔夫主导的新联盟条约签署进程,而杜达耶夫从事车臣分离运动是被挑唆的结果——挑战叶利钦领导的俄罗斯联邦政府。其他民族冲突也与此类似。

其三,语言、文字政策是族群政治生活中的敏感问题。苏联时期,俄语成为各族友好共处的工具和媒介。而到苏联末期,坚持语言、文字的民族化(“去俄语化”)政策,乃是民族主权进程的重要步骤,也是引发族群冲突的重要内容。在俄罗斯帝国征服之前,吉尔吉斯人等中亚族群长期运用察合台文字,1926年后改用拉丁字母,到1940年,则改用基里尔字母。在苏联时期,中亚的斯拉夫语族(俄罗斯族、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无需知晓突厥语,只需掌握俄语,斯拉夫语族“在语言方面处在非常舒服的地位”。^②随着苏联解体进程的开启,斯拉夫语族在语言、文字方面面临冲击和排挤。1989年前后,塔吉克、乌兹别克、土库曼、哈萨克等加盟共和国都先后通过了《国语法》或类似法律,在语言文字方面开始主权化进程,提高民族语言的地位,而将俄语作为族际交流语。1989年9月23日,吉尔吉斯共和国通过《国语法》,规定吉尔吉斯语是唯一国语,法律颁布后,法律、科研、政府事务等都要尽快改用吉尔吉斯语。针对政府的《国语法》,南部乌兹别克的“阿多拉特”组织提出奥什地区实行自治,并宣布乌兹别克语为官方语言,在大学和中专教育中争取乌兹别克族的语言-文化权利。

其四,苏联末期的社会生活日益政治化,民族精英的分离主义趋势明显,各级精英都利用民族主义作为其组织和动员社会的思想武器。例如,乌兹别克共和国出现了名为“比尔利克”的组织,表面上号召人们支持和拥护改革,实现共和国的民主化,捍卫人权,实际上却提出激进民族主义口号(克格勃副主席称之为纳粹主义。^③)1989年6月,中亚费尔干那地区爆发了乌兹别克族针对土耳其梅斯赫特人的暴乱,大量梅斯赫特人受害,苏军迅速介入而中止。吉尔吉斯共和国出现了如“阿多拉特”(乌兹别克族组织)和“奥什地区”(吉尔吉斯族组织)组织。“阿多拉特”要求实现乌兹别克族的高度自治,被视为分离主义主张,且与安集延的“比尔利克”组织存在互动协作;^④而吉尔吉斯族的“吉尔吉斯斯坦民主运动”(ДДК)则希望吉尔吉斯共和国从苏联分离,同时要求压制共和国内部的乌兹别克族分离运动——这就是两大政治派别的分歧所在。^⑤

吉、乌两族因不断上升的民族主义而对抗尖锐。所谓“吉尔吉斯民主运动”其实是吉尔吉斯家族政治的现代版。该派别以共产党的反对派面目出现,以民族主义为号召。“吉尔吉斯民主运动”和“阿多拉特”两个政治化(甚至已经激进化)组织替代了政府功能,互不认可,无法达成共识;而政府对一些尖锐问题不作为、或回应失当,必定丧失主导权。青年人的住房问题是冲突的直接导火索。奥什和伏龙芝两大城市成为吉尔吉斯族占地运动的主要场所。许多吉尔吉斯族青年自行占地,建造房屋。在伏龙芝和奥什,俄罗斯族人口占绝对多数。俄罗斯族对吉尔吉斯族青年的做法较为容忍,因为他们并不认为这些地区是祖先居住的地方,并不反对给青年人分地建房;而吉、乌两族都自认为是原住民,因而不能容忍对方侵入,这样就陷入尖锐冲突。如果按照“比什凯克方式”,一

① Правда от экс-генпрокурора СССР Сухарева об Ошских событиях 1990 года и путче 1991 года. <http://russkg.ru/>

② Я. Ю. Забелло, А. Д. Собянин Русские в Киргизии: современное положение и прогноз // Профи, 1999г, №11, С. 31-33.

③ (俄)菲·博布科夫著,王仲宣译《克格勃与政权》,东方出版社2008年,第294页。

④ О. Ибраимов История кыргыз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Бишкек, Улуу Тоолор 2015г, С. 44.

⑤ В. Воропаева Д. Джунушалиев В. Плоских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а. Краткий курс лекций по истории Кыргызстана Бишкек 2002г С. 152.

视同仁地为吉、乌两族青年分地、建设住房,问题自然就会顺利解决;但形势却未能如此发展。整个1990年春天,吉尔吉斯族的“奥什地区”和乌兹别克族的“阿多拉特”两个组织都在积极活动,许多诉求互相排斥,针锋相对。苏联民主化改革的后果是对社会政治运动失控。

其五、族群矛盾成为政治斗争工具。地方政府决策不够明智、审慎,一些新兴政客甚至居心险恶地利用该问题实现政治目标,导致吉、乌两族矛盾尖锐化。地方领导人无能、或政策不力,客观上加剧了紧张形势。1990年5月27日,吉尔吉斯族集会,要求政府解决住房用地,在“奥什地区”(其领袖别克杰米罗夫的竞选纲领就是:为无地的吉尔吉斯族青年争取住房用地)的压力下,奥什市政府答应在奥什郊区给吉尔吉斯族无房青年拨地32公顷建房,但这些土地都是乌兹别克族的棉花田,该决定激怒了当地的乌兹别克族。显然,这种举措本身会挑起矛盾。在乌兹别克族抗议后,地方政府又被迫收回成命:5月31日,奥什市政府表示,将32公顷乌兹别克族的棉花地拨给吉尔吉斯族建房不合法。奥什市政府这种不够审慎、反复无常的做法,适足以那些居心叵测的挑唆者提供机会,将吉尔吉斯族和乌兹别克族对政府的诉求变成吉-乌两族之间的直接矛盾。乌兹别克族认为,吉尔吉斯族在政府部门占优势,政府成为吉尔吉斯族的政府,做出了损害乌族利益的决定,因而对政府丧失信任。吉尔吉斯族与乌兹别克族都有怨气,准备加强对抗。“阿多拉特”组织要求允许乌兹别克族自治,承认乌兹别克语为官方语言;同时采取现实的反制措施:奥什市的许多乌兹别克族房东拒绝租房给吉尔吉斯族,1500多名被乌兹别克族房东逐出的吉尔吉斯族也参与到要求建房用地的集会中。最终,6月4日,两族之间爆发了极其残酷的流血冲突,导致多人伤亡。

事后,苏联克格勃的调查结论认为:奥什州和市政府在民众工作——尤其是青年工作——上拖延推诿,解决土地利用问题上严重失误,造成了危险局势和族际关系的紧张,而地方政府对问题的严重性估计不足;等等。^①这些结论基本上符合事实。而受害的乌兹别克族强调:政府部门有默契,偏袒吉尔吉斯族、借机打击乌兹别克族。骚乱平定后,乌兹别克族向吉尔吉斯共和国中央提出八条要求:对1990年6月4日族际冲突的死难家属提供紧急救助;奥什州和奥什市党委全体下台;全部替换当地内务部警察并追究其责任;按照民族构成比例,民主选举城市和地区的法院、检察院、党和苏维埃机构的领导人等等;给所有急需建房用地的人拨出800公顷土地;在奥什师范大学和中专院校设立乌兹别克语的院系;克格勃追究吉尔吉斯族的“奥什地区”组织在暴行中的责任;等等。^②

奥什事件引发相邻的乌兹别克共和国的报复性反应,一些地区爆发了殴打吉尔吉斯人、焚烧其房屋的事件,大量吉尔吉斯族难民涌入吉尔吉斯共和国。如果乌兹别克共和国领导人也利用该问题大做文章,显然,中亚将爆发局部战争。^③在阿卡耶夫和卡里莫夫两位领导人的努力下,奥什事件得以尽快平息,没有继续发酵。但是,由于苏联解体前夕的乱局和紧随其后的独立进程,挑动和参与骚乱的罪魁祸首未受到及时追究和惩罚(在民族主义意识高涨的背景下,一些人甚至被视为“民族英雄”),也为未来埋下祸根。族际冲突及其流血事件的客观后果,令同处民族-主权进程的吉尔吉斯和乌兹别克斯坦两国强化了民族国家意识;但同时也强化了两国国内非主体民族的民族意识,导致所有邻族的相互隔阂加深。族际冲突成为民族国家的共同体验和强化训练,成为主权国家祭坛的牺牲。1991年后,吉尔吉斯等中亚新独立国家都开始了主权巩固阶段。所有国家都珍视其主权独立地位,对于族群问题尤其敏感;但是,新独立国家与苏联一样都是多民族国家,也像苏联一样,都需要建构多族和谐共存的国族认同。而1980年代改革时期高扬的民族主义则具有强大惯性,族群政治问题仍然尖锐。

① Ошская резня 1990 года. Хронология трагедии <http://www.fergananews.com/article.php?id=6601>

② М. Жирохов. Семена распада: войны и конфликты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бывшего СССР.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БХВ-Петербург, 2012г. С. 169.

③ А. Князев. Векторы и парадигмы киргизской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черки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Бишкек, 2012г.

三、2010年奥什事件:根源与后果

2010年4月,吉尔吉斯爆发了第二次“革命”,在第一次“革命”五年之后,新政府再次被推翻,巴基耶夫总统被迫出逃。随即,到六月份,在吉尔吉斯南部奥什等地区再次爆发了吉-乌族际冲突。吉尔吉斯国家委员会的调查报告表明,到2010年12月10日,在奥什州和贾拉拉巴德州发现426具尸体,381具已经被认领,多数是乌兹别克族(276人),吉尔吉斯族105人,其他族群2人。^①警察死亡10人,还有两名军人受伤。但是据非官方说法,骚乱的最初几天就已死去近800人。^②7月14日,一家独立媒体称,死亡人数超过2000人。^③官方数据还表明:2010年12月,被提起公诉的有5162人,拘留306人,其中271人被监禁。大多数被监禁的是乌兹别克族(230人),吉尔吉斯族39人,其他民族2人。^④2010年的六月事件堪称是1990年六月奥什事件的惯性延续,是新条件下的再爆发,二者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被称为1990年事件的“续集”)。吉尔吉斯前总统阿卡耶夫指出,2010年的事件与1990年具有相同的原因。^⑤确实,2010年六月事件与1990年奥什事件有许多相似性。相异之处是:与1990年不同,2010年的吉尔吉斯独立近20年,但其国家组织需要发展完善,而“革命”本身是主权进程的“逆进程”。

首先,吉尔吉斯南部吉、乌两族的结构矛盾仍然存在。吉-乌两族的非对称平衡成为族际矛盾的结构根源。费尔干那谷地(奥什、贾拉拉巴德等地)的族群竞争,是一个长期的现实。包括奥什在内的吉南部地区为乌兹别克族、塔吉克族、吉尔吉斯等族杂居地,但人口占多数的族群是乌兹别克族。吉尔吉斯国内有100多个民族,乌兹别克族是仅次于主体民族的第二大民族(占吉国人口15%),南部是吉国乌族的传统聚居地。由于费尔干那谷地的各族群杂居,人口密集,生存竞争加剧,各族间因争夺水源、土地、商业,乃至日常的龃龉和不睦屡见不鲜。乌国的乌兹别克族大量涌入吉尔吉斯南部,因其在本国经商受到种种限制,而在吉尔吉斯经商环境相对较为自由。同时,受到乌族压力、害怕伊斯兰激进分子、以及2005年“革命”的成功(巴基耶夫亲族和南方同乡也在政治上受益),南部吉尔吉斯族大量移居北方。如同1990年一样,吉、乌两族的社会分化进程其实还在继续:乌兹别克族不喜欢上学,喜欢从商,收入较高,且都聚居在自建、自购的住房;而吉尔吉斯族从农村来到城市,在接受高等教育后都进入政府部门或军警部门,但是收入较低,没有自己的住房,许多人几乎成为流氓无产者。这是导致族际冲突的社会经济前提。

表4. 吉尔吉斯南部三省人口情况表(2009年3月统计数据)

省份	奥什省	贾拉拉巴德省	巴特肯省
人口数量	1088898	993761	431067
乌兹别克族人口比重	28.3%	24.8%	14.5%

其次,两次骚乱都发生在政权虚弱、政治混沌时期。1990年,包括吉尔吉斯共和国在内的苏联全境都处于失序、混乱状态;而2010年4月的“革命”推翻了巴基耶夫政权,吉尔吉斯南部成为政治真空,“临时政府”无力控制。2010年6月10日爆发的族际冲突是“革命”的副产品。“革命”推翻了巴

①④ Э. С. Токтосунова, Специфика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процессов в условиях системной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на примере Кыргызстана) //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кспертиза: ПОЛИТЭКС 2013г, Т.9, № 4, С. 245 - 246, С. 246.

② “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 правда”: в Оше тысячи погибших, беспорядки начинаются в Джалал - Абаде, <http://www.polit.ru/news/2010/06/12/1000/>

③ Президент Узбекског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культурного центра Кыргыз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обратился с открытым письмом к Исламу Каримову <http://www.fergananews.com/news.php?id=14964>

⑤ А. Князев, Векторы и парадигмы киргизской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очерки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Бишкек 2012г, С28.

基耶夫政权后,以奥通巴耶娃为首的“临时政府”尚未完成自我合法化的政治程序和仪式(对新宪法的公投和颁布、十月大选等),各界对其执政能力仍持怀疑,反对者势力仍很强大。吉国的“不断革命”引起地区各国(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的不满和担忧,白俄罗斯认为“革命”和“临时政府”非法,容留前总统巴基耶夫。主要大国和邻国对其外交走向尚未明确,各国因参加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吉国代表问题而争吵激烈。骚乱成为对新组建的“临时政府”重建合法性过程的严峻考验。

吉国出台的语言、文化政策是导致族际冲突的导火索。如同1989年一样,2004年吉尔吉斯政府再次通过了《国语法》,进一步明确吉尔吉斯语的国语地位,强化吉尔吉斯族的主体民族地位。鉴于其他中亚国家也先后通过了类似法律,从吉尔吉斯国家的发展来说,这似乎是合理的举措,但该政策客观上排挤了非主体民族的语言、文化空间,引起疏离感,成为族际冲突的直接原因之一。之后,主体民族吉尔吉斯族与其他族群(东干族、乌兹别克族等)爆发了冲突,看起来并非偶然。对于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不相称的情形,乌兹别克族也已看到了危机所在,希望积极参政。2006年,乌兹别克族人士提出争取语言、文化权利的要求:呼吁将乌兹别克语认定为官方语言,政府部门任用更多乌兹别克族。2007年,吉、乌两族在贾拉拉巴德、奥什、巴特肯等地已爆发过多起小规模族际冲突。^①2008年、2009年间,吉、乌两族青年多次密集爆发冲突,这些事件被吉尔吉斯媒体刻意掩盖,而乌兹别克斯坦和俄罗斯等国媒体详细报道了类似事件,并对吉国政府提出批评。这些冲突事件未能及时公正解决,导致各族群都有怨气,准备酝酿新的冲突。2010年四月“革命”之后,乌兹别克族人士如卡德尔江·巴蒂罗夫、伊诺姆江·拉苏罗夫等人借机组织游行,提出要在奥什建立乌兹别克族自治区。吉尔吉斯官方认定,提出乌兹别克族自治乃是分离主义要求,是赤裸裸的挑唆行为。

在1990年冲突中相对受害更甚的乌兹别克族仍对该次冲突记忆犹新,且认为吉尔吉斯政府始终对该事件处理不公,悲情浓重。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民族主义者散布民族复仇言论。卡德尔江·巴蒂罗夫称:乌兹别克族已经等了二十年,终于等来这一天。^②

其三、“第三种势力”的挑唆和推动。许多人指出族际暴乱的背后有黑手推动,“临时政府”主导的舆论本能地将其归咎于巴基耶夫势力。据认为,巴基耶夫逃回南方后,一度准备将南方作为基地与“临时政府”对抗,扭转局面或实现南北分治,或通过乱局消解来自“临时政府”的压力,使其疲于应付,其最直接的目标是抵制6月27日即将举行的新宪法公决。一些人权组织表示,骚乱是有组织、有预谋的,确实存在所谓“第三股势力”,军警甚至抓到了一些外来的渗透者,但幕后推手是谁,至今未明。奥什市长梅尔扎克玛托夫表示:有人散布挑动性言论和虚假信息,如乌兹别克族的民族主义者如卡德尔江·巴蒂罗夫等人以及“临时政府”里的某些成员等等,还有一些不希望中亚地区安宁的外国势力。^③有受害者认为,骚乱是针对乌族的种族清洗,因而主要是吉尔吉斯极端民族主义者所为。

吉帕尔·杰克舍耶夫认为1990年事件是苏联中央政府挑起的,而2010年奥什事件乃是俄罗斯挑动的,他甚至援引卡里莫夫总统的话加以佐证:因为乌兹别克斯坦不驯服,一些外部大国希望利用奥什事件打击乌国,然后控制吉、乌两国,^④这些说法很难得到证实。在族际矛盾尖锐的条件下,很容易存在操纵利用的情况,火上浇油的做法会导致难以预料的后果。应该说9·11事件之后,美国首次实现了在中亚的军事存在。吉尔吉斯虽小,但是对于中亚地区具有全局性意义。鉴于吉尔吉斯成为美、俄等国地缘政治争夺的焦点,许多外部势力都希望利用吉尔吉斯的局势,服务于自己的目的。

其四,所谓“乌兹别克族问题”(“南部问题”)及其解决前景。在很长时期里,乌兹别克族是吉尔

① Вадим Кодюлин, Ош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драма с продолжением <http://www.pircenter.org/>

② ③ Мелис Мырзакматов, «В поисках истины. Ошская трагедия: документы, факты, интервью, обращения и заявления», Бишкек, Турар 2011г., С. 238-241, С. 278.

④ Если бы не дальновидность Каримова, возникла бы большая война // Учур, 13 января 2011г.

吉斯南部占优势的族群 所谓“乌兹别克族问题”始终是吉国政治精英关切、担忧或可以炒作的问题。2010年吉尔吉斯和乌兹别克斯坦都已是独立国家,一国的的问题必须从国际政治角度考量。吉国有舆论认为,南部有脱离该国的危险倾向:乌兹别克语占据优势,成为当地的准官方语言,居民收听乌语广播、看乌语电视频道,日常生活也已经“乌兹别克化”,乌族聚居区已成为吉国“飞地”。乌兹别克族不能融入吉尔吉斯的社会政治生活(无意融入,或刻意保持特殊性),甚至参加一些非法的宗教-政治组织,^①吉尔吉斯政府当然不能容忍,也为渲染“乌兹别克族问题”提供了依据。中-吉-乌铁路项目始终进展缓慢,原因之一就在于吉国政治精英忌惮铁路将加强南部乌族与乌国的联系,导致南部失控。

在中亚地区,乌兹别克斯坦有历史优越感,也表现出雄心和抱负。乌国人口最多,经济、科技实力雄厚,且中亚的全部乌兹别克族占中亚五国总人口的一半以上,达3000多万,此外,乌兹别克斯坦与其他四个邻国都存在划界问题,与吉尔吉斯、塔吉克斯坦等国的划界问题至今未能妥善解决,双方互有“飞地”在对方境内,吉-乌两国和塔-乌两国边境经常爆发事端、甚至枪战。分布在邻国的乌兹别克族往往被视为乌国势力的延伸,一些国家对乌国表示疑惧和警惕。2001年的民意调查表明:44%的被调查者认为,乌兹别克斯坦对其国家有领土要求。^②“乌兹别克族问题”(一定程度上堪称“南部问题”)与“乌国威胁论”紧密联系。在吉国南部的乌族活跃时,乌国“比尔利克”组织就会发声,与之形成呼应和互动,更加引起吉国政府的疑忌,也给这些精英人士提供了炒作“乌兹别克族问题”(“南部问题”)、“乌国威胁”的口实。一些吉尔吉斯族精英人士主张强制同化乌兹别克族,其他中亚国家对非主体民族确有类似政策。例如,乌兹别克斯坦的许多吉尔吉斯族、塔吉克族被以不同方式同化,被迫自称乌兹别克族;土库曼斯坦也推行了类似政策。

1990年与2010年吉-乌族际冲突的后果有很大差别。如果说,按照吉国精英的看法,吉国的乌兹别克族是乌国势力的延伸,那么,族际冲突后乌族已被大大削弱,吉国的族群政治暂时维持平衡,有助于吉尔吉斯控制南部局势,乌国以人口作为地缘政治扩张的手臂被斩断。事实上,虽然吉国乌族在乌兹别克斯坦有大量亲族,但是乌国政府对邻国的乌族深有戒心。所谓“乌国威胁”得到缓解,这或许是吉尔吉斯国家获得的政治“红利”。但这种残酷的族际冲突为未来留下隐患,牺牲了长久的社会政治稳定。吉尔吉斯是多民族国家,这是一个现实,乌兹别克族是吉尔吉斯国内经济、政治方面重要力量,使其成为吉国社会的有机成分,应是吉国政府追求的目标。所有中亚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而吉、乌等族也需和谐相处,任何中亚国家都不应该以主体民族的民族主义为号召建设国家。

族际冲突导致严重的人道危机。2010年6月11日,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开放边界,接收并临时安置来自吉尔吉斯的难民111000人,其中多数是妇女和孩子。据统计,将近30万人涌入乌兹别克斯坦,其中大部分到7月中旬返回奥什等地。2011年1月,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内务部称,仍有169500人被迫逃离家园,很多人永远离开吉国——多数逃往邻国。两次大规模冲突给吉国社会(以及乌国社会)造成裂痕,给非主体族群带来的伤害和阴影短期内无法修复,原本就复杂微妙的吉-乌国家间关系更显脆弱。族际冲突也冲击了乌兹别克斯坦。如同1990年事件一样,乌兹别克斯坦对族际冲突的态度非常关键。乌国民众从族群感情出发,对吉国境内乌族的遭遇感同身受,许多亲族试图复仇,普通国民则对吉尔吉斯政府感到愤怒和敌视,而乌国政府也对该事件表达关切。作为有经验的政治家,卡里莫夫总统表现出克制和冷静:认为有人试图设局,用骚乱挑动乌国与吉国对抗,并反对以牙还牙,认为“这样思考问题的人都是我们民族的敌人”。^③与1990年一样,作为事件的重要相关方,乌国政府成

① Вадим Кодюлин, Душ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драма с продолжением <http://www.pircenter.org/>

② Атыргуль Алишева, Эмиль Шукуров, Анара Табышалиева,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на перекрестках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Бишкек 2001г. С.11.

③ О визит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еспублики Узбекистан И. А. Каримова в Бухарскую область <http://www.parusk.info/2010/06/19/26924>

为解决吉国族际冲突、为事件降温的关键性因素。2010年第二次奥什事件之后,卡里莫夫总统再次释放出善意、展示智慧,为事件降温,帮助吉尔吉斯政府恢复安定,其建设性立场得到吉国精英和国民的赞许。

对于族际冲突来说,区分哪个族群受害更甚、进而判断冲突的是非曲直,或许并非问题实质,冲突波及的乌兹别克族和吉尔吉斯族都是可悲的受害者;而相对来说,在吉尔吉斯民族国家建设进程中,作为少数族群的乌兹别克族会有更多危机感和焦虑。他们认为,吉尔吉斯政府未对2010年事件进行公正调查,对其罪魁祸首未予惩罚,由于吉国国内政治的许多问题,因而对乌兹别克族的严重关切未予充分重视,这种状况潜伏着隐忧。

四、结论

民族主义是现代政治生活中非常顽强的意识形态,美国学者米尔斯海默曾称之为“地球上最强大的意识形态”。民族文化差异、族群发展不平衡将长期存在,以族群为单位的经济、文化、政治竞争也将是常态。经验表明,族际冲突往往具有某种惯性。两次族际冲突之间的时期往往是族群力量消长变化(人口、语言文化优势、经济实力等等)的时期。族际冲突撕裂社会共同体,令族群之间丧失信任,隔阂和敌视增加,暴力成为解决族际矛盾时依赖的惯性路径,其爆发点往往是政治举措失当。必须建立完善的机制,防范族际冲突:对于具有族群色彩的日常冲突和不睦要控制在小范围内,避免其政治化、演化为族际仇杀;族际冲突往往并非单纯的内政问题,因此要严防某些恶势力挑唆;尽可能在初起阶段及时、妥善解决;在爆发族际冲突后,运用强制手段迅速平息,避免造成更严重后果。

政府是族群平衡的最后维护者。确保所有族群(而不是特定族群)的权益,而不能偏袒、或片面打压任何一方。否则,弱势族群(或受害严重的族群)就会对政府失去信任,而强势族群(冲突中占上风的族群)则会倚恃其优势超越政府之上,形成对抗政府、压制其他族群的能量。族际冲突具有其特定的历史阶段性。由于现代化进程和民族国家进程,多民族国家中的族际冲突很难避免。族际冲突与现代化进程和民族国家进程存在关联——当然,不能说现代化进程是导致族际冲突的直接导火线或其罪魁祸首。现代化特定阶段产生的问题,只能通过完善现代化进程加以消化、消解。

Abstract The two Osh Incidents that happened in 1990 and 2010, namely, the two serious ethnic conflicts between Kyrgyz and Uzbek, are typical cases of inter-ethnic conflicts in contemporary Central Asia. They lead to serious consequences which will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ethn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sides and on the relations among countries in Central Asia.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xamine the consequences of social-economic and social-political fissions between the two major ethnic groups, Kyrgyz and Uzbek in the south of Kyrgyzsta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historical-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ethnical-sovereign processes. It also attempts to explore both the mechanism of conflict generation and the root of such inter-ethnic conflict between the two ethnic groups. Recognizable patterns will be identified and discussed based on these examinations and explorations.

(侯艾君 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 北京 100006)

(责任编辑:于红)